

## 【文献工作与 研究】

# 中 国 近 代 的 百 衲 本 大 藏 经

杨之峰(首都图书馆,北京 100021)

[摘 要] 百衲本大藏经是中国近代十余家刻经处联合刊刻的一部大藏经。它的续藏部分没有刻完,正藏也未完成结集,主要以单行本流传,但对近代佛教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本文简述了近代各刻经处的设立和百衲本大藏经的结集情况,着重论述了这部大藏经的文献特点。

[关键词] 刻经处; 结集; 百衲本大藏经; 文献特点

[中图分类号] G256 [文献标识码] B [文章编号] 1005-6610(2009)09-0078-03

晚清时代中国佛教衰敝至极,明末清初刻成的《嘉兴藏》经版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,清代官刻《龙藏》申请印刷极其困难。刚刚跨入佛门的杨文会“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”<sup>[1]</sup>,于是在同治五年(1866)创立金陵刻经处。随后砖桥、杭州、苏州、长沙、扬州藏经院、常州天宁寺、北平、天津等十余个刻经处相继设立。它们分工合作,刊刻单行本佛经,以期合成一部大藏经。历时七十余年,这部百衲本大藏经终究没有完成。但它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全国广泛流通,甚至远销日本、南洋、美洲等地,对近代佛教产生巨大影响。

### 1 近代刻经处的设立

金陵刻经处在近代刻经处中成立最早、刻经最多、影响最大。杨文会(1837—1911),字仁山,安徽石埭县人。同治五年,他携全家移居南京,主持江宁工程局,进行战后重建。他与同事王梅叔、魏刚己、赵惠甫(烈文)、刘开生(翰青)、张浦斋、曹镜初(耀湘)等讨论弘法事业,约志同道合者 10 人,创办金陵刻经处,草订《刻经处章程》,募刻方册本大藏经。初期设写手 1 人,刻手 7 人,主僧 1 人,香火 2 人。<sup>[2]</sup>经费除发起人按月认捐外,派人外出劝募。杨文会“日则董理工程,夜则潜心佛学,校勘刻印而外,或诵经念佛,或静坐作观,往往至漏尽就寝。”<sup>[1] 582</sup>后来两次出使欧洲,在伦敦结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,深结道谊。深感当时政治腐败,“誓不复与政界往还”。<sup>[1] 583</sup>他根据日本《续藏经》编成《大藏辑要》目录,共收佛典 460 种三千三百余卷,又拟作大藏和续藏的提要,陆续刻成全藏。《大藏辑要》尚未刻成,1911 年秋,杨仁山离开人世,他将刻经重任托嘱欧阳渐、陈镜清、陈义三人。欧阳渐(1871—1943),字竟无,江西宜黄人。他两次至南京追随杨文会学习佛法,专攻法相唯识学,在金陵刻经处从事整理、刻印佛经。1922 年,他于南京公园路创立支那内学院,培养佛学人才,并率师生积极认真地校刻佛典。1937 年冬,日寇侵入南京,欧阳渐率众携带内学院的一万多块经版迁往四川江津县,建支那内学院蜀院,与其弟子吕澂继续讲学与刻经。

江北刻经处由妙空法师(1826—1880)创立。法师俗名郑学川,博通教典。同治五年(1866)在金陵受比丘戒,名妙空,自号刻经僧。金陵刻经处主僧 1 人,即由妙空担任。法师外出劝募时,则另请一人代理。其间,妙空还在苏州、常熟、杭州、如皋设立四个刻经处,而总其事于扬州东乡砖桥镇接引禅院的江北刻经处。同治十三年(1874),金陵刻经处的藏板地北极阁为他人觊觎,起争端,杨文会将经版移藏常府街寓所,继续刻经。妙空则回到江北刻经处,从此两人分工合作,相互补充,不相重复,以期汇成全藏。江北刻经处以刻般若类为主。光绪六年(1880),法师刻《大般若经》至 425 卷,自知圆寂时至,手持《龙藏》全函付镜之法师。镜之在秦邮放生寺藉香清公的协助下,终于募刻完成《大般若经》600 卷。又得 80

岁高龄的朗月法师募捐接引禅院相邻废屋,兴建法藏寺,作为藏版之所。江北刻经处共刻经三千余卷,抗日战争期间,经版损坏严重。<sup>[3]</sup>

光绪二年(1876)曹镜初设长沙刻经处,并邀杨文会去商议刻经事宜。所刻有《心经注解》、《大乘起信论疏》、《法界宗五祖略记》等,皆由龙城曾氏捐资。其后释贯如创立扬州藏经院刻经处,也是按《大藏辑要》刻经。镜之法师主持江北刻经处时,与扬州藏经院相互配合,续刻经藏数百卷。光绪后期,常州天宁寺住持清镡(1852—1922)又设立毗陵刻经处,俗称天宁寺刻经处,至民国初年,数十年间,刻大小乘经七百七十部,2460卷。<sup>[4]</sup>

北京刻经处由徐文蔚、蒋维乔、梅光羲、江味农等创立。徐文蔚(1878—1937),字蔚如,浙江海盐人。民国初年任职于财政部会计司。曾参访谛闲、印光法师,为金陵刻经处捐资。1917年编成《杨仁山居士遗著》,受其精神感召,1918年与任职北京的诸大居士创立北京刻经处,自任校刊之责。1922年徐文蔚由京至津,又与许丹创立天津刻经处。<sup>[5]</sup>两个刻经处校刻经典近两千卷。

除上述刻经处外,同治、光绪年间还有江西刻经处、扬州众香庵刻经流通处,苏州人许灵虚、沈善登等私人,也按金陵刻经处的版式刻经。即半页10行,每行20字,细黑口,左右双边,上下单边,有界行,板框高约17cm,宽约13cm,字体为横平竖直的老宋体,装订为四眼线装。天台山住持敏曦、观宗学社谛闲、法雨寺印光及杭州慧空经房、王弘愿潮安刻经处等,所刻佛经版式、字体都不同于金陵刻经处,不属于百衲本范围。

## 2 百衲本的结集

杨文会在《报告同人书》说:“鄙人志愿,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。”<sup>[1]418</sup>这全藏包括正藏、续藏两部分。正藏是对明南藏、北藏、嘉兴藏、清龙藏等现成大藏经的校刻,续藏是搜罗诸藏未收的佛典,特别是流传日本、高丽而在中国失传的唐宋注疏、清乾隆以后的解经著作。杨文会刻经的重点放在续藏上。<sup>[6]</sup>他仿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例,编辑《大藏续藏提要》,分类编定,以便初学。《大藏续藏提要》没有编完,杨文会心目中的全藏规模不可得知。《大藏辑要》在各刻经处努力下,已经完成。但《大藏辑要》的目的是“以便学者随时购阅”<sup>[1]417</sup>,没有结集的必要。真正进行结集的,只有《百衲本方册清龙藏》。

徐文蔚等人创立北京、天津刻经处,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补齐一部《清龙藏》。1936年北京刻经处的《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》称各处“刊刻单行本藏经,较之《龙藏》尚缺经部十八种,计三十八卷;论部三十九种,计一百七十八卷。统共仅缺五十余种,计二百一十六卷。较全藏所缺不过百分之三四,是以各处所刻板本虽皆相仿,卒不能汇成全藏。”<sup>[7]</sup>经北京刻经处同人的积极募刻,至1937年6月基本补刻完毕。因为当月的《微妙声月刊》已刊出《预约百衲本清龙藏经简章》:“本处集合北平、天津、金陵、支那、扬州、砖桥、众香庵、苏州、杭州十处刻经处版本,汇成《百衲本方册清龙藏经》。全书分二千册,重新编排分合,装订整齐。各书均照市尺长七寸四分,宽四寸六分,大小长短完全一律……全书分四次出齐,第一次二十六年十二月,出般若、宝积、大集、华严、涅槃等五大部。第二次二十七年四月,出五大部以外及小乘等经。第三次二十七年八月,出律论两藏,暨西土圣贤撰集。第四次二十七年十二月,出此土贤圣著述……全藏分装一百五十函……”预约发出不到一个月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平津相继沦陷,无数难民流落街头。徐文蔚与佛教居士设立“妇孺临时救济院”收容难民,终以劳累成疾,于此年冬逝世,编订《百衲本清龙藏》的计划因此搁浅。

## 3 百衲本大藏经的文献特点

百衲本大藏经虽然没有刻印完毕,但从《刻经处章程》和各地刻经实践,仍可以看出它的特点。

### 3.1 严格遴选佛典,维护正法传统

杨文会刻经的目的是供人钻研义理以弘扬正法,因此他特别注意维护佛经的纯正性。金陵刻经处在成立之初,就订下“三不刻”原则:“凡有疑伪者不刻,文义浅俗者不刻,舛坛之书不刻。”<sup>[1]467</sup>所刻之书都经过严格遴选,审慎辨析。<sup>[8]</sup>杨文会还多次婉拒朋友和居士捐刻不纯正经本的要求。如有人寄来一部梵本《高王观世音经》,称经过某番僧鉴定,要求刻印流通。杨文会在《与郭月楼书》中说:“细阅经本,未能深信,请为长者陈之。俗间所传《高王观世音经》,古人已辨其伪。”<sup>[1]467</sup>——指出其伪在何处,说明不能承刻之缘由。关于慧能《金刚经注解》,金陵刻经处虽藏有刻本,“但此本前代高僧疑其为贋作,敝处故未能刊板。”<sup>[1]495</sup>他编集《贤首法集》,将贋作《华严策林》等四书排除在外。江北刻经处、常州天宁寺刻经处

基本上是在翻刻《清龙藏》，无须判定真伪。北京刻经处徐文霁也特别注意遴选经典。有人发心刻印署名唐代嘉祥大师注释的《观无量寿经义疏》，文霁发现意义含糊，写信请教印光法师，法师判定为东洋耳食之徒冒名之作，便婉谢发愿者，引导其转刻其它经典。

### 3.2 底本精良，逸典重现

金陵刻经处十分注意底本的选择。如(唐)法藏《大乘起信论义记》，大藏本、(明)袞宏修订本、日本逸典本都不免割裂之病，杨文会“求之数载，复获别行古本，真藏公原文也。”又“雠校再三，重加排定。”<sup>[1]370</sup>陈仲培捐资拟刻《法华指掌》一书，“敝处因《指掌》不佳，不愿流通”<sup>[1]439</sup>，而将存资改刻《观楞伽经》。为寻觅善本，杨文会曾遍游国内名山古刹，同治十三年(1874)只身往洞庭西山求旧经，因旅费短绌，几乎不能返回。光绪十六年(1890)，他托内弟苏少坡寄书旧友南条文雄，委托其从日本代购中国古代逸本佛书，从此两人鱼雁往还，南条文雄、岛田蕃根、赤松连城等人帮助购得中国古佚佛书近三百种，其中有些珍本只能借抄，抄毕又寄回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，他又派弟子欧阳渐东渡日本，寻访佛教遗籍。杨仁山择其善者进行翻刻。他编的《大藏辑要》中，还有以日本新编《缩刻藏》、《续藏经》为底本者<sup>[9]</sup>，这些是国内失传上千年而又无法购求者。北京刻经处分别翻刻了《续藏经》中的(唐)智慧轮译、(唐)般若译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、《高丽藏》中的(唐)法月译《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天津刻经处曾派许丹去日本取回国内失传的律宗和密宗经论数部。敦煌遗书是近代发现的又一佛教宝藏，欧阳渐《募刻佛教全藏疏》中说：“敦煌石室出现多经，别鉴汇抄可成千卷。”<sup>[10]</sup>但由于尚未整理，不便使用。北京刻经处从私人借得敦煌写经，翻刻了(唐)法成译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一卷。

### 3.4 校勘精审，学者水平

金陵刻书“务使校对、刷印，均极精审”<sup>[1]418</sup>，杨文会亲自刊定句读、校勘考订。他在《与释自真智圆国瑛书》中说：“《瑜伽师地论》久未完工。”“更有东洋求得之古本书籍，改定行款，校正讹舛，甚费心力。会独任甚难，其易办者，则让他人校刻。是则私衷所窃愿也。”<sup>[1]430-431</sup>杨文会搜葺诸家注疏，点句会文，生前只完成前五十卷。欧阳渐秉师嘱续刻后五十卷，五年之中付出极大心血，常常达旦不休，至1917年，历经二十寒暑，终于刻完这部巨著。从日本购得《释净土群疑论》七卷，正拟刊刻，杨文会发现“原书朱抹太多，写者易误”，于是特请日本友人“再购未经涂抹之本”<sup>[1]501</sup>，以省校对之苦。杨仁山幼女圆音法师经常协助校勘经籍。门生桂伯华、李证刚、梅光羲、黎端甫、蒯若木等则校勘“其易办者”。江北刻经处、天宁寺刻经处等依《清龙藏》刻经，而用明南藏、北藏或宋藏校勘，并将校记刻在每卷卷末。北京刻经处由徐文霁负责校勘，唐贞元译本《华严经》校刊记，则是与印光法师合订，晚年得之海外的《华严经疏科文》十卷，请上海李圆净居士代为整理。后期所刻《大唐内典录》十五卷、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十卷，由佛教学者苏晋仁校勘。

总之，百衲本大藏经是继《嘉兴藏》之后的又一部私刻大藏经，经费来源完全依靠募捐。刻书地遍及大半个中国，参与人数众多，并且由僧人为主转向以居士为主，没有统一的机构，却又能密切合作。单部流通，流通量之大，历代罕见，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，出现佛教信仰与佛学研究并重的局面，完成了中国佛教的转型。<sup>[11]</sup>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杨文会. 杨仁山全集[M]. 合肥: 黄山书社, 2001: 582.
- [2] 肖永明. 流布经教利人天——金陵刻经处140年散记[J]. 佛教文化, 2006(5): 16-27.
- [3] 武元康. 妙空法师和江北刻经处[J]. 佛教文化, 1999(1): 21-22.
- [4] 于凌波. 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[M]. 北京: 宗教文化出版社, 1995: 16-18.
- [5] 张 磊. 天津刻经处述略[J].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, 1994(1): 58.
- [6] 方广钊. 杨文会的编藏思想[J]. 中华佛教学报, 2000(13): 179-205.
- [7] 北平刻经处. 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[J]. 微妙声月刊, 1937(5).
- [8] 陈素清, 董剑英. 近代金陵本佛典浅说[J]. 图书与情报, 2004(4): 87-89.
- [9] 肖 平. 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[M].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03: 166-167.
- [10] 欧阳渐, 等. 募刻佛教全藏公启疏[M]. 南京: 金陵刻经处, 1919.
- [11] 张 华. 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教思想转型[M]. 北京: 宗教文化出版社, 2004: 22-33.

[作者简介] 杨之峰(1968—)，男，副研究馆员，整理点校古籍8种，发表论文数篇。